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 研究

佟永功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 研究

佟永功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佟永功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 / 佟永功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4

(满族 (清代) 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22-767-0

I. 满… II. 佟… III. ①满语—研究 ②满族—民族历史—档案资料—研究—辽宁省—清代 IV. H221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25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2 $\frac{1}{2}$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1-2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技术编辑: 杨 雪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姚飞天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于1961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在少数民族语文系学习满文专业，1966年学成毕业。五年间，除每天学习满文专业课外，又学习了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语言学概论、中国通史、清史专题、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等基础课。五年的在校学习，特别是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的半年实习，使我深深地喜欢上这个专业，决心到保存有清代满文档案的档案馆做一辈子整理和翻译工作。

1966年6月行将毕业分配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留校待分配。1968年8月，毕业分配结束不久，我即持派遣证来到设在沈阳的东北档案馆报到。时该馆已实行军事管制，驻馆军事代表刘某得知我前来报到，开始大为吃惊，经我说明后表示接受我的报到，但告知我馆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均在省委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我也到学习班去。当晚我在馆内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睡下，次日上午随回馆办事的老杨同志到了学习班。两个多月后，又随馆内大多数人赴盘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直到1972年12月才被分配回辽宁省档案馆工作。时东北档案馆已经在1969年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其所藏历史档案除拨给吉林、黑龙江两省档案馆者外，其余部分移存辽宁省档案馆，其中包括大部分清代满文档案，这使我稍感欣慰。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中，相关活动很多，无暇开展档案业务工作。

真正开始馆藏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已经是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1980年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批判“文化大革命”对档案工作的破坏，提出“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工作方

针，全国档案工作迅速出现新的局面。辽宁省档案馆藏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及专题满文档案史料译编工作，纳入了馆内业务工作计划，我全力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之中。

在业务工作中，我逐渐体会到，要想提高业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必须结合业务工作进行相应的学术研究。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确定在三个方面：满语满文、馆藏历史档案的来龙去脉及清史、满族史中的某些问题。但我也深知，自己从事的本职工作是将清代的满文公文档案翻译成汉文，相关的历史档案学及明清史学根底浅薄，首先应当多读知名学者的有关论著，了解他们的论点和论据，不断充实自己。在此基础上，我根据翻译清代满文档案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史料，有选择地拟定一些题目试写论文，反复修改，逐步提高水平，小有成果。今退休在家，闲来无事，乃将以往写过的东西收拢到一起，阅读过后颇感汗颜和惶恐，因为发现一些不妥和错谬之处，深恐贻误读者。正在不安之时，承蒙辽宁民族出版社社长助理、编审吴昕阳同志告知拟将拙作结集出版，遂将所作筛选后逐篇修改、补充、定稿。自以为，满语满文方面的《达海改革初创的满文》《满汉语文的接触与交融》《乾隆皇帝规范满文》，辽宁省档案馆藏历史档案之来龙去脉方面的《明代辽东察院及山东总督备倭署档案的来历》《崇谟阁〈汉文旧档〉寻踪》《日伪时期东北地区历史档案的大集中》，清史方面的《盛京内务府的设立及沿革》《清代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要》《乾隆朝〈大学士傅恒议奏赫哲费雅喀及库页费雅喀人贡貉赏乌林办法折〉赏析》，尚可一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几篇文章是我早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已在文末括号内注明。

我学疏才浅，努力钻研又很不够，文章中所写都是一管之见，纰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佟永功

2008年12月

目 录

自 序	1
-----------	---

满语满文研究

满文的创制	1
达海改革初创的满文	9
满语文和汉语文的差异	22
满汉语文的接触与交融	31
乾隆皇帝规范满文	40
满文形动词简释	58
沈启亮与《大清全书》	67
清末至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仍用满文行文	71
李德启先生译著《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述评	79
满学研究的新成果	
——评《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	88

辽宁历史档案述要

明代辽东察院及山东总督备倭署档案的来历	93
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	
——从崇谟阁本《满洲实录》说起	105

从崇谟阁《满文老档》说起	116
崇谟阁《汉文旧档》寻踪	134
《天聪九年档》的汉译及其史料价值	152
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	161
日伪时期东北地区历史档案的大集中	169
“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与 东北地区的历史档案	179
东北档案馆的设立与撤销	191

清代档案与史事探微

盛京内务府的设立及沿革	202
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问题补絮	223
清代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	235
清代盛京参务活动述要	258
从《三姓档》看清代吉林官庄	279
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探析	295
从一件命案的处理看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 库页岛的管辖	308
乾隆朝《大学士傅恒议覆赫哲费雅喀及 库页费雅喀人贡貂赏乌林办法折》鉴析	319
雍正皇帝整饬旗务述论	334
皇太极纳谏述评	348
抚顺又名抚西考	367
永陵大祭小考	376

满文的创制

满文，是满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自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下令创制，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而被废止，大约通行了三百余年。如今，它已成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的一种。近年，由于清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大量以清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涌现，满语文也常常被提及。但是，有关满文的创制和改革、使用状况、发展历程、满文文献、历史作用等问题，许多人并不清楚，有必要做一些普及性的宣传。同时，随着满语文研究的日益深入，新成果不断出现，也值得推广和介绍。笔者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翻译，兼及满语文研究，谨将心得撰写成文供感兴趣者参考，这里首先说明满文的创制。

一、创制满文的历史背景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所有的民族都是先有自己的语言而后来才有自己的文字。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也有些民族因为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没有创制自己的文字而是借用了其他民族的文字。无论如何，创制文字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严格说，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是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在明朝统治下居住于辽东山区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相继统一建州、海西、东海女真各部。昔日部落林立,称雄争长,相互杀掠的激烈斗争状况渐趋缓和,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简称满族)开始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之间的交际只限于语言就显得很不够了,因为语言交流只能是面对面地进行,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没有文字,就无法用书信同远在异地他乡之人进行沟通和联络。

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有的。据清代人福格说:“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①这就是说,当时满族人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但一些满族人在同蒙古人或汉人的交往中学会了蒙古文或汉文,于是就借用蒙古文或汉文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交流。相比较而言,使用蒙古文者多一些,使用汉文者少一些。笔者认为,福格所言应当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过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满族人中能使用蒙古文或汉文者仅是少数,大多数满族社会下层之人只能讲满族语,并不懂蒙古文或汉文,所以有事要告知远在他乡之人时,必须请人代写蒙古文或汉文书信。待收信人接到蒙古文或汉文书信时,又必须请既识蒙古文或汉文又通满族语之人从中翻译,而这样的人却很少。这一切使得大多数满族人不仅深切感受到不懂蒙古文或汉文的不便,尤其认识到创制自己文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父祖遗甲 13 副起兵,经过十余年的浴血奋战,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正在

^① 福格:《听雨丛谈》,载《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向建立自己政权的方向前进。发布政令，指挥军事行动，对外联络和交涉等事务，使用蒙古文或汉文不仅有诸多不便，更有损其金国汗的尊严。创制自己文字的意念，在努尔哈赤的思考中逐渐明确起来。

一方面是满族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文字的阶段，一方面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作出了创制满文的历史性决定。

二、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创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国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唸）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唸）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学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①

这段记述写得生动、具体，十分精彩，内含一系列重要历史信息。

第一，“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第1页，华文书局影印本。

古语通之。”“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正在形成中的满族当时尚无自己的文字，往来行文只能借用蒙古文，给信息的传递造成极大的不便，必须创制自己的文字。

第二，努尔哈赤在解释为什么必须创制自己的文字时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学蒙古语者不能知矣。”这个说明是令人信服的，抓住了事情的实质。事情的确如此：汉人有汉文，不论是否识字，读汉文给他听，他是可以听懂其意思的。蒙古人也一样，有蒙古文，不论是否识字，读蒙古文给他听，他也是可以听懂其意思的。满族人则不同，没有满文，往来书信用蒙古文书写，未学过蒙古语文的人，读蒙古文给他听，他是听不懂的，必须有人翻译成满语说给他才可以。这是努尔哈赤对当时满族人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不得不借用蒙古文传达信息所面对的困境最深切的感受和最清楚的说明。

第三，巴克什额尔德尼自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国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当即反诘说：“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据《满文老档》记载：“聪睿恭敬汗所立之一切善政，俱由额尔德尼巴克什录编成书。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①据此可知，额尔德尼是满族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得到努尔哈赤的完全信赖。正是在办理文案事务的过程中，额尔德尼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言和文字。正因为这样，所以努尔哈赤决定由他主持创制满文，可谓是知人善任。当额尔德尼表示出胆怯时，努尔哈赤当即不容分说地指出，“何汝等

^①《满文老档》译注（上）第37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额尔德尼无言以对，只好承应下来这项艰巨的任务。

第四，当额尔德尼又提出不知从何着手创制满文时，努尔哈赤则给予具体指示：“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看来，努尔哈赤不仅决心创制满文，而且对如何创制满文亦作了深入思考，可以说是胸有成竹了。简单说，就是借用蒙古文字母记录满语语音。努尔哈赤不愧是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不仅在满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决心创制满文，而且指出参照蒙古文创制满文，实在难能可贵！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满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二者具有同一渊源，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努尔哈赤精通蒙古语文，显然是满蒙两种语言具有某种共性的感觉告诉他应当参照蒙古文字创制满文。也正因为这样，同样精通蒙古语文的额尔德尼也茅塞顿开，遵照努尔哈赤的命令，参照蒙古文字创制出满文，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以上就是我们应当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关于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满文一条史料中得到的历史信息。

三、初创满文的缺陷及其根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综观人类的文字，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表形文字，一种是表意文字，一种是表音文字。一种语言究竟采用哪一种符号系统，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创制文字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并不排除领袖人物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

满族的直接先人是女真族。女真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历史悠久，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宋代，女真人曾南进至黄河流域，建立了金朝。元时，金朝灭亡，黄河流

域的女真人汉化，而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受蒙古人控制。明取代元后，女真人又受明朝统治，至明末逐渐强大起来。女真人曾创制过女真大小字两种文字，但使用范围有限，至努尔哈赤父祖崛起前已基本被弃用，此时的女真人多以蒙古文字作为交际工具。努尔哈赤作为正在形成的满族共同体的杰出领袖，顺应满族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作出参照蒙古文字创制满文的决策，使满文走上表音文字的道路，反映出满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

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所参照的蒙古文字，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是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善的文字。它有元音字母 5 个、辅音字母 24 个，共计字母 29 个。多数字母为音节字母，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 4 种书写形式。一个单词由一个或几个音节字母组成。书写时，笔端沿中轴线自上而下，各种笔画分布于中轴线两侧，一气呵成。

蒙古文字的特点之一，即个别音节字母有两个不同的读音。对于以蒙古语文为母语文的人或精通蒙古语文的人来说，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在两个不同读音中正确选择一个读音，因而不致发生错误；但对初学蒙古语文的人，则往往不知道在两个读音中选择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因而常常发生错误。额尔德尼在参照蒙古文字创制满文时，大概是因为他精通蒙古文字的缘故，照搬了这些蒙古文字母，而未结合满语语音特点对字母加以适当改造，于是给正确识读初创之满文造成很大困难。这种困难就是“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①。此外，额尔德尼初创的满文，

^①《满文老档》译注（下）第 1196—1197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还有其他一些缺陷，特别是不能准确对音译写更多的汉字，遂有后来达海改革之举。

四、满文创制的完成及其历史意义

额尔德尼受命后如何创制满文，用了多长时间完成并开始推行，史籍中未见记载，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做出推测。

著名的《满文老档》原本（即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旧满洲档》），自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以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已确知：它是清入关前官方形成的档册计40册，用额尔德尼初创的满文、达海改革后的满文及初创满文向改革后满文过渡期间不规范满文书写，用纸掺有明朝辽东都司等衙署的公文，记事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起至崇德元年（1636）止。

查乾隆年间重抄之盛京崇谟阁本《满文老档》可知，在所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事前贴有一小黄纸笺，上书汉字“原档残缺”字样。据此可知，《满文老档》原本记事并非自1607年始，而是早于此时。早于何时起记事，今已无从得知。姑以1607年计，前推至1599年，不过八九年，也就是说额尔德尼奉命创制满文后的八九年时间内即完成了创制，旋即开始推行使用。

回顾满文的创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努尔哈赤个人主观意愿或一时心血来潮，而应看到其背后的深刻社会历史因由。当时满族社会正在由分散走向统一，人们渴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生产并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努尔哈赤作为新兴满族共同体的杰出领袖，顺应历史前进潮流，正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人们的愿望，而作出创制满文的历史性决定就是其具体行动之一。额尔德尼等满族

学者，在创制满文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完成创制任务，使满族有了文字，其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总结创制满文的历史经验，一方面有领袖人物的决策，一方面是专家学者的实际创制行动，二者缺一不可。

满文的创制既然顺应了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促进满族社会快速地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为其后来取代明王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毋庸讳言，满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和制度明显落后于汉族。自满文创制后，一些重要汉文典籍开始被翻译成满文，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得以在满族人中传播，满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而迅速提高。可以说，是满文引领满族跨进了更高文明的门槛。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开放包容是满族的优秀品格。

达海改革初创的满文

达海，满洲正蓝旗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卒于天聪六年（1632），享年 38 岁。其祖世居觉尔察地方（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祖父博洛，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即率部归附，得授官职。达海出身满族官宦之家。

据史籍记载，达海“生而颖异”^①，“赋资明敏”^②，“九岁读书”^③。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20 岁时被“简界机要”^④，“凡国家与明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有诏旨应兼汉文音者，亦命传宣，悉当上意”^⑤。可见，达海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精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才学出众，颇受努尔哈赤器重，召值左右，受命承担了改革初创满文的重任。

一、达海改革初创满文的思路和方法

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努尔哈赤之命初创的满文，受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在推行过程中很快地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识读困难，二是不能准确对音译写某些汉字。达海在努尔哈赤身边专司文案事务，是初创满文的主要使用者，对其

①③⑤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宰辅卷 1《达海》篇。

②④ 康熙九年敕立达海碑文，载鸳渊一：《满洲碑记考》。

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必定早已了然于心，而如何加以改革也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的总体思路是：充分利用原有音节字母的基础，适当加以改造和规范，使一个音节字母只有一个读音或一个读音只用一个音节字母记录，做到容易识读，避免歧义；同时创制一些新的字母并利用满语固有的切韵规律，做到准确对音译写某些汉字。初创满文改革的顺利完成，证明达海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雍正初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编纂的《八旗通志初集》《儒林传·大海》篇，对达海改革初创满文作出了总结：“太祖初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同噶盖扎尔固齐将蒙古字创立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复命大海（即达海——引者）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又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两字连写切成一字，其用韵之巧较汉字切法更为稳叶。”^①这个总结，应当说是对达海改革初创满文全面、准确的概括。下面，笔者对此试作具体说明和分析。

第一，针对初创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以“增添圈点分别语气”。

所谓“形”，即指字母的书写形式，亦即字形；所谓“声”和“语气”，即指字母的读音，亦即发声。作为表音文字，理应字母与其读音一对一，即一个字母只有一个读音或一个读音只用一个字母记录。初创的满文未能完全遵循这一原则，一个字母往往有两个不同的读音，或一个读音用多个书写形式不同的字母记录，给人们的识读造成很大的困难。翻开用初创满文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26《儒林传·大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